

中国铜商文化研究资料系列丛书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

《运铜纪程》校注

〔清〕

黎恂 著

杨黔云 总主编

王瑰 校注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运铜纪程》校注 /（清）黎恂著；杨黔云总主编；
王瑰校注.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7
（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
ISBN 978-7-5643-5634-7

I. ①运… II. ①黎… ②杨… ③王… III. ①铜—有
色金属冶金—工业史—研究—云南—清代 IV.
①F426.3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79846 号

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

《YUNTONG JICHENG》JIAOZHU

《运铜纪程》校注

[清]黎 恂 著
杨黔云 总主编
王 瑰 校 注

出 版 人 阳 晓
策 划 编 辑 黄庆斌
责 任 编 辑 吴 迪
特 邀 编 辑 罗业恺
封 面 设 计 严春艳

出 版 发 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 行 部 电 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 政 编 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成都市金雅迪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成 品 尺 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35.25
字 数 541 千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5634-7
定 价 98.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28-87600562

总 序

铜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瑰宝，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中闪耀着璀璨的光芒。早在公元前四千多年前位于今甘肃境内的人类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就发现了人类使用的铜制物品，这是最早发现的生活在中华大地上的人们使用的铜制物品。当然，当时的铜以天然的红铜为主。之后，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我们的祖先进入到了青铜器时代。随即铜和铜制品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伴随人们走过了历史长河，我国也因此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

地处边疆地区的云南，素以产铜闻名于世。《云南铜志》载：“滇之产铜，由来久矣。……我朝三迤郡县，所在多有宝藏之兴轶于往代，而铜亦遂为滇之要政。”储量丰富的铜矿，为云南铜文化的产生、发展创造了条件。滇铜又以滇东北的铜而闻名，从考古发掘和文献典籍记载来看，滇东北地区产铜较早。新石器时代，滇东北地区就已有较成熟的青铜器^[1]。金正耀、岑晓琴用铅同位素对商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及其他商周青铜器的铜料进行分析，认为妇好墓青铜器及其他商周青铜器的铜料有的来自今滇东北的昭通、东川、会泽、巧家等地^[2]。到了汉代，滇东北地区的铜已负盛名。西汉在滇东北设置朱提郡领堂琅县，其辖地为今巧家、会泽、东川一带，任乃强先生认为“堂琅”是夷语“铜”的意思。《华阳国志》也记载，堂琅产“银、铅、白铜^[3]、铜”。堂琅不仅产铜，还出产铜器，从全国各地考古出土的汉代铜锡铭文记载来看，以朱提、堂琅制造的铜洗为多，说明汉代滇东北的铜器制造已经为其他地区服务了。可见，滇东北的昭通、会泽、东川等地区从汉代开始就是铜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这也为该地区以铜为中心的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提供了前提条件。

云南铜矿开发最盛的时期应为明清两朝，其中尤以清朝前期的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广泛。明朝建立后，随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社

会发展对铜的需求不断增加。1382年，明王朝击败蒙古残余在云南的势力，统一云南后，云南铜矿资源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清朝建立后，康、雍、乾时期对云南铜矿的开采，特别是对滇东北地区铜矿开采达到顶峰。据严中平先生推断，滇铜开采最盛时年产达1200万~1300万斤^[4]，《清史稿》对云南铜业生产经营情况的记载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雍正初，岁出铜八九十万，不数年，且二三百万，岁供本路鼓铸。及运湖广、江西，仅百万有奇。乾隆初，岁发铜本银百万两。四、五年间，岁出六七百万或八九百万，最多乃至千二三百万。户、工两局，暨江南、江西、浙江、福建、陕西、湖北、广东、广西、贵州九路，岁需九百余万，悉取给焉。矿厂以汤丹、碌碌、大水沟、茂麓、狮子山、大功为最，宁台、金钗、义都、发古山、九度、万象次之。大厂矿丁六七万，次亦万余。近则土民，远及黔、粤，仰食矿利者，奔走相属。正厂峒老砂竭，辄开子厂以补其额。”^[5]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矿丁六七万”左右的大规模铜矿如汤丹、碌碌（落雪）、大水沟皆为滇东北的铜矿。

铜矿业的大规模开发为云南，特别是滇东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一）促进了西南边疆地区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清代铜运是一个浩大而又繁琐的工程，滇铜京运涉及大半个中国。云南铜矿主要分布于滇东北、滇西和滇中三个区域，零散的铜厂分布，最终构筑了复杂的铜运体系。据《滇南矿厂舆程图略》“运第七”篇：“京铜年额六百三十三万一千四百四十斤，由子厂及正厂至店，厂员运之，由各店至泸店之员递运之，由店至通州运员分运之；局铜则厂员各运至局；采铜远厂则厂员先运至省，近厂则厂员自往厂运。”由于铜运，这一地区的古驿道和商道得以修筑、受到保护，并不断开辟，促进了该地区交通业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铜运而开通了多条入川线路，“乾隆七年，盐井渡河道开通。将东川一半京铜由水运交泸”，“乾隆十年，镇雄州罗星渡河道开通。将寻甸由威宁发运永宁铜斤，改由罗星渡水运泸店”，“（乾隆）十五年，永善县黄草坪河道开通。将东川由鲁甸发运宁一半铜斤改由黄草坪水运交泸”，这些入川线路成为以后滇、川人员往来、

货物运输的要道。另外，乾隆十八年至二十二年任东川知府的义宁，在任期间不断勘测铜运线路，“查有连升塘、以扯一带捷近小路一条，直至昭通，将长岭子、硝厂河等站裁撤，安建于朵格一路运送，移建站房、塘房，及法纳江大木桥一座，俱系义府捐资修建”^[6]，最终修建了从东店经昭店直至四川的铜运干道。

（二）促进了清代全国铸币业的发展

清朝时期，铜钱使用的广泛度应为历朝之最，促进了铸币业的发展。从康熙至嘉庆，清朝的铸币数量从有代表性的“京局”——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来看，是不断增长的。康熙六十年（1721），户部宝泉局和工部宝源局各铸36卯，铸钱67万余串^[7]，而至嘉庆时期，据徐鼐所著的《度支辑略》钱法条记载，户部宝泉局，每年鼓铸72卯，铸钱899856串；工部宝源局，每年鼓铸70卯，铸钱437448串，如遇闰各加铸4卯^[8]。自雍正七年始，朝廷在云南广泛开采铜矿以后，宝泉、宝源二局铸钱铜料主要来源于滇东北汤丹、碌碌等铜矿开采的“京铜”。云南铜原料还供应多个省份铸币，如江苏宝苏局、江西宝昌局、湖南宝南局、湖北宝武局、广东宝广局、广西宝桂局、陕西宝陕局、浙江宝浙局、福建宝福局、贵州宝黔局、贵州大定局等。滇铜广泛供应“京局”和各省局铸币，促进了清朝前期铸币业的发展。另外，铜矿开采还促进了云南本省铸币业的发展。滇铜京运和外运各省，由于路途遥远，运铜艰难，成本较高。据《续文献通考》钱币条记载，明嘉靖年间，因大量鼓铸银钱，朝廷决定在云南就近买料铸钱，以节省成本。明万历、天启年间，朝廷曾两次在滇开设钱局鼓铸铜钱。清康熙二十一年（1682），云贵总督蔡毓荣上书朝廷建议在蒙自、大理、禄丰、祥云开局铸钱。雍正元年（1723），宝云局于云南、大理、临安、沾益、建水设炉四十七座鼓铸铜钱。据《铜政便览》载，自雍正至嘉庆年间，云南省先后设云南省局、东川旧局、东川新局、顺宁局、永昌局、曲靖局、临安县局、沾益局、大理局、楚雄局、广南局等十一局铸钱。各铸局虽然“复行停止，中间兴废不一”，但是比较诸局铸钱规模、数量、开设时间，地处滇东北地区的东川旧局、东川新局影响较大。

（三）促进了中原文化的传入

由于云南铜资源储量丰富，清初朝廷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铜矿开采的政策，最终迎来了“广示招徕”的局面，内地相邻诸省的富商大贾，都远道招募铜丁，前来采矿。据《东川府志》记载：乾隆二十一年（1756），云南巡抚郭一裕奏“东川一带……各厂共计二十余处，一应炉户、砂丁及佣工、贸易之人聚集者，不下数十万人。……且查各厂往来，皆四川、贵州、湖广、江西之人”^[9]。乾隆四十一年（1776），云南约有移民人口95万^[10]，而矿业开发中“矿工中绝大多数是移民”^[11]。大量外来移民的涌入也改变了滇东北地方的人口结构，据民国《昭通县志》载：“当乾嘉盛时，鲁甸之乐马厂大旺，而江南湖广粤秦等省人蚁附靡聚，或从事开采，或就地贸易，久之遂入昭通籍。”^[12]因此，随之而来的就是内地文化涌入云南。从滇东北现存众多会馆来看，会泽、昭通、巧家等地的古城都保留着众多内地移民修建的会馆。会馆是内地同乡移民建立联系的场所，是展现各地文化特色的窗口。当时涌入东川府开采铜矿的外省移民，形成一定规模和实力，并在东川地区修建的会馆有：江西人所建会馆“万寿宫”，湖南、湖北人所建会馆“寿佛寺”，福建人所建会馆“妈祖庙”，四川人所建会馆“川主宫”，贵州人所建会馆“忠烈祠”，陕西人所建会馆“关圣宫”，江苏、浙江、安徽人所建江南会馆“白衣观音阁”等。涌入昭通从事矿业开发和进行商贸活动的内地移民也建立了众多会馆，如：四川人建立的“川祖庙”，陕西人建立的“陕西庙”，江西人建立的“雷神庙”，福建人建立的“妈祖庙”以及两广会馆、两湖会馆、云南会馆、贵州会馆等。从各会馆供奉的神像、建筑风格、雕塑、绘画等来看，无论是福建人供奉的妈祖，还是江西人供奉许真君、山西人供奉关圣大帝，以及火神庙供奉的火神娘娘、马王庙供奉孙悟空、鲁班庙供奉的鲁班等，都显示出中原文化的痕迹，同时又带有各地文化的特点。建于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的“三圣宫”（楚黔会馆），位于铜厂运送京铜至府城途中的白雾村驿站，是东川府产铜高峰时期，财力雄厚时设计建成的。三圣宫大殿内正中塑关羽，两侧为关平、周仓像，左边供孔子牌位，右边塑之文昌帝君，而故名“三圣宫”。将关羽、孔子、文昌共融于一庙之中，充分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待宗教世俗的实用性及儒道合流的泛神现象。

清朝前期滇东北大规模的铜业开发，为该地区的地方历史文化内涵增添了丰富的内容。我们把以古东川府（今会泽县）为中心，大致包括滇东北会泽、东川、巧家以及相邻四川的会理、会东、通安等地域，由于铜矿开采的繁盛，而形成的独特的地方历史文化称为“铜商文化”。“铜商文化”研究除前所述的铜业开发的历史、铜运、铸币、移民与文化传播之外，还有许多内容可以挖掘，如：考古资料、地方官员的奏折、地方史志、文献通志、家谱、碑文等资料的整理与校注；铜业开发对滇东北环境影响的研究；移民与民族融合研究；铜政研究；铜的冶炼技术研究；铸币与金融发展研究；铜与东南亚、南亚经济贸易交流和文化传播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内容，是很有地方历史文化特色的，也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为深入开展以铜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滇东北地方历史文化研究，曲靖师范学院成立了“中国铜商文化研究院”。校注云南“铜政四书”成为研究院开展工作的第一步。

研究院成立以后，针对铜商文化研究资料的繁多芜杂，确定了首先收集整理资料的工作思路。2015年，我们决定对清代铜业铜政古籍中保存完好，内容完整的四本书进行校注，合为云南“铜政四书”。四部古籍中，《云南铜志》《铜政便览》《滇南矿厂图略》三部都是清代云南督抚及产铜地方、铜政官员等必备必阅的资料。《云南铜志》系由乾嘉时期辅助云南督抚管理云南铜政数十年的昆明呈贡人戴瑞徵根据《云南铜政全书》及省府档案编纂，资料内容记载时间截止于嘉庆时，凡铜厂、陆运、京运、各省采买、铸币等的各项管理制度及经费预算等都一一备载；《铜政便览》成书于道光时期，未题何人所纂，全书共八卷，内容框架与《云南铜志》基本一致，但补充了道光时期的资料，滇铜生产衰落期的面貌得以呈现；《滇南矿厂图略》为清代状元，曾任云南巡抚的著名植物学家、矿物学家吴其濬编纂于道光年间，该书保存了丰富的清代矿冶技术资料，并有大量矿冶工具的清晰绘图。王昶的《云南铜政全书》残佚后，云南铜政的详情就以这三本资料所载最为详备了。《运铜纪程》是道光二十年京铜正运首起主运官大姚知县黎恂运铜至北京的全程往返日记，如实记载了滇铜万里京运的全部运作过程，与前三书合观，清代铜业铜政的全貌得以较为完整的呈现。

云南“铜政四书”的校注，出于为读者尽可能丰富地提供清代云南铜业铜政全貌资料的目的，主要采取资料补注的形式进行校注，在我们有限的的能力范围内，尽量搜集相关资料补缀进去，期以丰富的材料启发研究的思路，所以我们的校注除非证据十足，一般不下结论性的语言。就每本书的校注而言，由于内容体例各有特点，如《云南铜志》《铜政便览》多数据，《滇南矿厂图略》多图，《运铜纪程》也可谓是游记，所以其校注要点各有侧重，校注方式不能划一，但求方式与内容的适宜。

这四本书的整理校注，得到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青睐，双方开展了合作，并获得2016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的资助。具体的校注工作主要由我院青年研究人员负责完成。在校注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问题：一是资料补注校注形式可能会导致校注显得繁杂，但这种校注方式也是一种新的尝试；二是补校资料缺乏与清代宫廷第一手档案资料的比对，今后我院将加强对这部分档案资料中有关铜文化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三是缺乏第一手现场调查资料，铜厂、铜运路线的调查资料补充，会使这些文献的记录更为丰富、清晰，这也是我院今后工作的重点。

经过近两年的努力，我们的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即将印刷出版，我们的研究工作也将进一步推向纵深。在此，谨向对我们的工作给予大力支持云南省图书馆和贵州省图书馆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帮助我们成长的校内外专家学者、支持我们工作的各位校领导和职能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衷心感谢；向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云南“铜政四书”整理校注的各位编辑，以及四位校注者和研究院的其他工作人员表示感谢。祝我们的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注 释

[1] 鲁甸马厂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有铜斧、铜剑等较为成熟的青铜时代文明的代表器物。

[2] 李晓岑：《商周中原青铜的矿料来源的再研究》，《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3）。

[3] 白铜是一种铜合金，呈银白色而不含银，其成分一般是铜 60%、镍 20%、锌 20%。

[4] 严中平编著：《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7-42。

[5] （清）赵尔巽等撰：《清史稿》，中华书局，1978：3666。

[6] （清）方桂修、（清）胡蔚纂、梁晓强校注：《乾隆东川府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266-267。

[7] 《清朝文献通考》，商务印书馆，1937：4980。

[8] 戴建兵：《清嘉庆道光年间的钱币研究》，《江苏钱币》，2009（4）。

[9] 乾隆《东川府志》卷十三《鼓铸》卷首序、卷七《祠祀》，光绪三十四年重印本。

[10] 秦树才、田志勇：《绿营兵与清代移民研究》，《清史研究》，2004（3）。

[11] 李中清：《明清时期中国西南的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清史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4：86。

[12] 民国《昭通县志》卷十《种人志》。

前 言

《运铜纪程》，清代贵州遵义（治今贵州省遵义市）人黎恂著。道光二十年，云南大姚知县署理云州知州黎恂被委任为该年京铜首起正运官。道光二十年七月二十日（1840年8月17日），黎恂自云南省城昆明启程，经嵩明、寻甸、马龙、沾益、宣威、威宁、毕节陆路官道至四川永宁，自永宁乘船沿永宁河至纳溪入川江，下泸州。在泸州铜店领铜装船，遂沿江东下，至江苏仪征转入运河。沿运河至天津，卸铜转剥船运至通州，再起剥，车运至户部宝泉局、工部宝源局验收入库。按额交毕铜数，由户部堂官带领觐见皇帝。而后离京返滇，取道保定、郑州、南阳，绕道常德、铜仁至遵义，在家逗留四十余日。自遵义南下贵阳，过安顺，经平彝官道入滇，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日（1842年8月15日）到达昆明销差。前后历时二年，往返行程一万六千五百里，备极艰辛。辑途中日记（只缺道光二十一年三月二十日，乙巳）汇为两编，一为《京运纪程》共两卷，一为《回黔纪程》一卷，但并未刊刻印行。民国时期，贵阳著名藏书家凌惕安采得，将两书合抄为一本，命为《运铜纪程》。

《运铜纪程》成书后，仍未大行于世。今凌惕安抄本保存在贵州省图书馆，仅有两套，分别为两册本和三册本，其保存完好，纸张硬实、墨迹清晰、书写工整，甚为难得。民国时期贵州文献杂志《贵州文献季刊》二、三期合刊，刻印了原书四分之一强，今贵州省图书馆、贵阳市档案馆均有藏，但多有别字、衍字、漏文等。任可澄主编的《民国贵州通志》已着手收录该书，未果而辞世，故不得录于其中而闻名。贵州省文史馆藏有完整刻本，但错误仍多。至今，该书仍不广为人知，但是其内容却有较高价值。

《运铜纪程》的内容，可分为三大块，即黎恂之所为、所见、所感。

所为之事，大要在于运铜主官的职务履行。凡领导随员、安排大事、

管理船队、应急决策、危机处理、公关协调、检查监督等，皆亲历亲为，且逐日详细记录。这项内容，是目前可见的清代百余年滇铜京运史上，唯一一份铜运主官的具体事务记录，是对空白的填补。同时也可以之观照记载详备的清代京铜运输诸制度法规的具体执行情况，这也是该书最大的史料价值所在。其他内容，如闲时游览名胜古迹，与沿途官员的往来接触等，也可还原道光时期官场实景。

所见之事，包罗万象，但使之下笔记述的内容，必定是黎恂这位已有大半身阅历的官员见所未见或是能触发其诸多感怀的景物和事情。而这些，或者是具有典型地方代表性的景物和事项，或者是反映特定时代特征的景物和事项等，如在毕节官道上看见的纷纷运铅者，在武汉、天津看到的征调到沿海抵御英军侵略的兵员对沿途的滋扰，还有萧条的秦淮河，以及长江沿岸没落消失的集镇，桑蚕种植已经进入黔东一带，沿途遭遇的跋扈霸道的八旗官员，等等，都是很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对于研究清代鸦片战争前后的经济、政治、军事变化，以及沿途经济、民风、环境、社会生活等，也都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所感之事，即黎恂沿途的各种感想，各因事、因景、因遇而异，有忧国忧民、有顾影自怜、有悲天悯人、有妄自菲薄、有牢骚满腹，透视出的是一个积极有为而淡泊名利的下级官员的细腻真实的心理。结合其沿途与诸类官员的交往情况，对于进一步研究正在没落的清王朝的官员们的心理状况也有较高价值。

作者黎恂（1785—1863），嘉庆十九年（1814）年三甲第七名进士。父黎安理，以孝义著称，誉满乡里，闻于京都，嘉庆中授山东长山县知县。黎恂为安理长子，督教最为严格，故黎恂德行庶务双修，文才武略兼备。中进士后，出任浙江桐乡知县，针对当地特点，以安静为治，奖励学士、提携学子，并好读不倦，以“人以进士为读书之终，我以进士为读书之始”自励，为桐乡士子传为佳话。后世桐乡修县志，列为桐乡名宦，并为之作传。嘉庆末，其父卒，遂辞官归籍丁忧。临回之时，轸念乡梓，以自己的养廉银白银万两购书，携带回遵义。丁忧结束，又请病假，在家近十五年，以读书、为学、授徒为事。后贵州闻名全国的“西南三巨儒”莫友芝、郑珍、黎庶昌，都依赖黎恂从桐乡购买回的书籍，以及黎恂的为学指引，成

为名家。黎氏子孙在黎恂之后，终清一代，名士辈出，黎氏遂崛起为遵义第一名门，声名不坠，都肇端于黎恂此次回乡。道光十四年（1834），黎恂进京参加部选，拣发云南以知县用。初到云南，即遇曲靖府平彝县民发动叛乱，黎恂临危受命，署理平彝知县，三昼夜疾驰至平彝，迅速平定叛乱。后署理新平知县数月，即入方志《名宦传》。后又在大姚知县任上，创立团练，当叛乱之际，屡次成功抵御叛乱，保卫大姚平安。云贵总督林则徐，在全省推广其办法，并以“卓异”考评向朝廷举荐黎恂，黎恂遂升任东川府巧家厅同知。以出仕本非心愿，未赴任而称疾辞官，回籍修身读书。同治二年（1863）卒。

黎恂本有作旅行日记的习惯，在领铜差之前，已作有《北上纪程》。领受铜差后，又有友人力劝其抄录沿途公文。从此本《运铜纪程》来看，黎恂似乎没有抄写，可为一憾，但这个遗憾本是美中不足，不当苛求。

至于，黎恂究竟为什么要作此《运铜纪程》，其所言之“以备遗忘”应是主要原因之一，毕竟其时，滇铜京运已经一百年，运官已历数百人之多，却无人记录下这趟确保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生活平稳运行的万里征程，对有历史感、抱负感的文人而言，本身就可谓是一种义务的缺失。此外，更主要的就应当是一种情怀的展示。黎恂，从其生平事迹来看，他是一个有情怀、有抱负、有能力的官僚，从《运铜纪程》中记录的很多事情来看，也确乎如此。他热爱这个国家的山川草木、生灵百姓，也有推动这片土地成为尧舜乐土的激情和干劲。但是他缺少施展才华的舞台，看到的又是自己有心无力的衰世景象，像陶渊明一样归隐田园，也是他在这部日记中多次流露的心境。当然，黎恂归隐田园，与陶渊明还是很不一样的。陶渊明的归隐是道家的归隐，黎恂的归隐是儒家的归隐，是“施于有政，是亦为政”的孔子教海的践行。黎恂不热心仕途，两次辞官回乡，购书回家，广纳学子读书，自己亦不倦于读书，为学近三十年，正是这种儒者情怀的反映。

今依照贵州省图书馆藏凌惕安三册抄本，斗胆校注黎恂此书，也秉持该书的上述两大特点：其一在于补充滇铜开发、京运之相关资料，以便将滇铜京运放置到更完整的背景下考察研究；其二在于努力还原黎恂此行所行、所见、所感的背景依托，所以凡相关官制之流变、制度之详情、地方

之沿革、山川之渊源、古迹之由来、人物之生平、环境之变迁、名物之功用等，都尽力有所补注，以便窥探其有所依据的真实心理状态，提供尽可能多的资料。

当然，本人也是鄙陋之人，为人浮躁、为学浅薄，再加时间催人，粗糙之处，在所难免，所注对象之相关文献多不能一一检索齐备（有的资料相信在清代中央档案或是通过所有相关方志的细密爬梳一定能找到，但所要投入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自度实无承受之力），遂多以《府县志》《一统志》等总括性文本为补，更无暇考辨每条相关文献的异同及其原因所在，只能提供相关文献的线索。斗胆敢请阅者诸公，尽情批判，以便鞭策区区知耻而后进，庶几减少流毒，少污人眼，得在圈中苟且偷生。

鄙陋后学 王 瑰

2017年3月

凡 例

一、《运铜纪程》原书本无目录，本校注中的目录系校注者根据行程变化而私自拟定，以为阅读检索之便。

二、《运铜纪程》原文有自注，或出于页眉，或补于页行之间，或出于所注字词句之后随文而出，然皆小字。在本校注中，凡页眉之注皆以小字附于其出注段落之末，其他则附于其补、注字词句之后，依照原文次序不改，仍用小字。

三、为阅读之便，文中不管音义校补之注，皆以方括号的形式在原文断句的标点符号后标出，在每节末集中出注，每节重新编号。

四、凡需注音之字，一般用其同音常用字注，若同音字亦生僻，则用汉语拼音注。

五、较常用字的异体字，直接在文中替换为今字，不出注。

六、诸注释主要以引用古籍文献中相关资料的形式生成，注文内容本身一般不再出注。出注者主要是帝王年号的公元年与古地名之今名，以小括号的形式标注在帝王年号后。为阅读之方便计，在同一条注文中反复出现的帝王年号，才省略重复标注。其他认为有必要的注文之注则以小括号内“己案”的方式注出。

七、文中单字的音形义的辨别，全部依照《汉语大字典》，注文中不再标出。

八、正文和注文所引文献中的缺字和无法辨认的字体，皆以“□”代替。

九、注文中引用的文献名称，根据行文需要，或出现于补注字词句之后，或补充于该条注文末。

十、校注中或有引用《贵州文献季刊》二、三期合刊所载《运铜纪程》刻本者，只称《贵州文献季刊》。

十一、注文所引文献亦多有引用其他文献者，但古人引用重意同不重文同，多闻杂己语，难以辨明引用起迄，所以对这类引用中的引用不再用引号标出，引用诗词碑刻则标出。

目 录

一 至沪纪程	1
道光二十年五至六月	2
道光二十年七月	8
道光二十年八月	20
二 川江纪程	40
道光二十年八月	41
道光二十年九月	47
道光二十年十月	56
道光二十年十一月	72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	115
三 长江纪程	141
道光二十年十二月	142
道光二十一年正月	147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	154
道光二十一年三月	193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	235
四 运河纪程	243
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	244
道光二十一年四月	260
道光二十一年五月	270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	292
道光二十一年七月	331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	353

五 交铜纪事	359
道光二十一年八月	360
道光二十一年九月	363
道光二十一年十月	367
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	375
道光二十一年十二月	389
道光二十二年正月	396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	399
六 回滇纪程	400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	401
道光二十二年三月	451
道光二十二年四月	484
道光二十二年五月	494
道光二十二年六月	496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	507
附录一 黎恂经行府厅州县表	513
附录二 人物索引表	518
附录三 民国《续遵义府志·黎恂传》	528
参考文献	530
后 记	548